

海洋文藝叢書

# 現代中國作家選論

余 惠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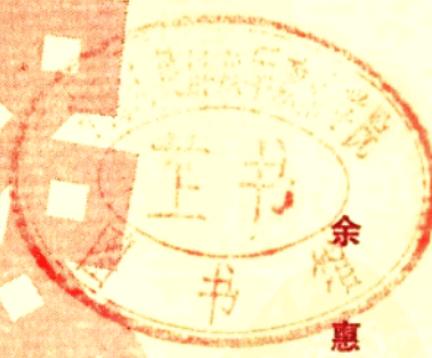


海洋文藝社出版

現代中國作家選述論

012283

中國文學



余光中  
惠書

**現代中國作家選論**

余惠著

— • —  
出版：海洋文藝社  
香港西營盤安寧里三號地下

印 刷：大新印刷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九四七號地下

— • —  
1976年12月初版



## ■ 目 次 ■

魯迅的歷史小說及《理水》的管窺	1
徐志摩與新月派	25
郁達夫其人其文	41
異國看雲的梁實秋	75
自稱“過河卒子”的胡適	90
三位一體的朱自清	105
台灣省籍作家許地山	120
拍案而起的聞一多	136
魯迅筆下的林語堂	151
興會無前的柳亞子	167
鄭振鐸——闡士與文學評論家	184
來自呼蘭河畔的蕭紅	199
為影劇工作一生的歐陽予倩	212
廬隱與白薇	230

—Hopes

## 魯迅的歷史小說 及《理水》的管窺

《理水》是魯迅先生一篇以歷史人物、事件爲題材的小說，作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收入《故事新編》。魯迅先生逝世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因此本篇可說是他後期的創作之一。案《故事新編》共收同類型的小說八篇，但創作的期間前後延續達十三年。現依編次記其創作年月如下：

《補天》：一九二二年十一月；

《奔月》：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理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采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鑄劍》：一九二六年十月；

《出關》：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非攻》：一九三四年八月；

《起死》：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由上可見，作者不是根據創作的先後編排次序，而是以歷史人物出現先後爲序列。這一個處

理方法，多少說明了魯迅先生創作這一系列的歷史小說，是頗有計劃的。題目的統一為兩個字，也顯示了這一點。創作較早的兩篇，《補天》原名《不周山》，《鑄劍》原名《眉間尺》，後來也改為一律兩字了。《故事新編·序言》中說：

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一個人住在廈門的石屋裏，對着大海，翻着古書，四近無生人氣，心裏空空洞洞。而北京的未名社，却不絕的來信，催促雜誌的文章。這時我不願意想到目前；於是回憶在心裏出土了，寫了十篇《朝花夕拾》；並且仍舊拾取古代的傳說之類，預備足成八則《故事新編》。……

這就說得很清楚，開始創作是一九二二年，而成書的意圖則在一九二六年。可是當時的環境和工作沒有容許魯迅先生完成這個計劃。只寫了《奔月》、《鑄劍》兩篇，他便由於大革命高潮的到來，在形勢的需要下，前往廣州，擔負了中山大學的重要職務。這麼一推延便是九年，直到一九三五年底再寫了四篇，才達到了原定的預算，集八篇而成書。

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到，魯迅先生的寫作活動，固然有主觀的願望，但首先是服從於當時客觀實際的要求。他自稱所寫的東西為“遵命文學”，不應該只看成謙虛，而正是我們應當學習的那種

以文學作為武器的精神。

“拾取古代的傳說”而寫成小說，並不是“好古”，也不是宣揚陳舊的觀念，而是“古為今用”，以歷史的題材為今天的需要服務。這個現實的目的，魯迅先生是說得很清楚的。在前引《序言》中，他說：

對於歷史小說，則以為博考文獻，言必有據者，縱使有人譏為“教授小說”，其實是很難組織之作，至於只取一點因由，隨意點染，鋪成一篇，倒無需怎樣的手腕；……

魯迅先生的態度是客觀的。他並不一般地反對寫作那種根據史料，經過研究，目的在於使歷史人物或事件重現的作品，而且認為那需要相當大的工夫。當然那樣的作品是否值得重視，恐怕還得從作者的立場、觀點和作品所起的實際作用去判斷。但他自己的創作，却不是這一類型。所謂“只取一點因由，隨意點染，鋪成一篇”，倒是他的謙辭，也不能看成“無需怎樣的手腕”。既要十分了解歷史（包括“正史”和“野史”）上大量的材料，正確地加以分析，而又需要對現在的社會情況有深刻的理解，肯定什麼，批判什麼都有鮮明的態度，然後以高度的藝術手法，使歷史事實和現實意義渾然統一起來，那就實在不是“教授小

說”所能做到的了。《故事新編》裏的八篇作品，不論在內容上或藝術上，都不是先先後後的許多其他作者以歷史題材而做的小說所能比擬，是並非偶然的。

要運用借古喻今的手法，一個原因是“古為今用”，這是革命者與學究的根本區別。另一個原因是由於在當時的環境中，魯迅的作品有人不准刊登，印成的書也被禁止發行，以至他的生命安全也遭受威脅，於是為了達到要把自己的話說出來的目的，不能不採取曲折迂迴的戰術。那是戰鬥的需要。就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即創作《理水》、《采薇》、《出關》、《起死》這四篇小說的同時，魯迅先生寫了一首七律《亥年殘秋偶作》，可以使我們對當時的政治形勢和魯迅先生在困難環境下堅持奮鬥的精神有比較具體的了解。這首詩是這樣寫的：

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  
塵海蒼茫沈百感，金風蕭瑟走千官。  
老歸大澤菰蒲盡，夢墜空雲齒髮寒。  
竦聽荒鶲偏闌寂，起看星斗正闌干。

這四篇作品，是小說，也是雜文，有很強烈的暗喻和諷刺成分，是在那種特定的戰鬥環境下出現的。有人以為不論在什麼情況下，都要運用

暗喻和諷刺，才是魯迅的風格，那是誤會或曲解。只要條件許可，魯迅先生其實喜歡直接而鮮明地說出自己觀點，一點也不暗晦。例如收在《且介亭雜文末編》中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便寫得清楚透徹，痛快淋漓，直截了當。看不到這方面，不可謂知魯迅先生。

這裏拿八篇中的《理水》來談一下，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用意，只是希望通過對一篇作品的粗淺探討，從魯迅先生的思想及藝術手法上吸取一些營養。

寫歷史題材的作品（小說是其中的一種形式），看來有一個先決的條件，就是對待古人採取什麼態度：是“厚古薄今”，還是“厚今薄古”？是盲目崇拜古人，還是能够進行正確的分析，以今天所能掌握的觀點，該肯定的加以肯定，該批判的予以批判？

這是作者及其作品代表著倒退還是前進，是保守還是革新的分野。

魯迅先生對待歷史題材的態度，是後者而不是前者。

在《故事新編·序言》的最後一段，他這樣說：

現在才總算編成了一本書。其中也還是速寫居多，不足稱為“文學概論”之所謂小說。敘事有時也

有一點舊書上的根據，有時却不過信口開河。而且因為自己的對於古人，不及對於今人的誠敬，所以仍不免時有油滑之處。過了十三年，依然並無長進，看起來真也是“無非《不周山》之流”；不過並沒有將古人寫得更死，却也許暫時還有存在的餘地的罷。

“無非《不周山》之流”的說法，是由於《不周山》（即《補天》）在最初發表時，有人以錯誤的觀點提出了不恰當的批評。魯迅先生對於來自各方面的批評是嚴肅對待的。來自戰友和朋友的批評，如果是正確的，他會很認真、很重視地接受；如果批評得不對，他一定把自己的觀點說清楚，決不貌作謙虛地說假話。但當敵人打着批評的幌子而實際是進行惡毒的攻擊時，他就一點不讓步，加以揭露，狠狠地還擊。他對於有人對《不周山》的批評，便不表示同意。事實上，那些批評者也根本不理解魯迅先生的創作意圖，說《不周山》“雖然也還有不能令人滿足的地方”，却是作者“要進入純文藝的宮庭”的“傑作”<sup>①</sup>，這

---

① 一九二四年《創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有《“呐喊”的評論》一文，其中對《不周山》說了這樣的話。《不周山》在《呐喊》初版時附在卷末，後來在第二版時由作者刪去，一九三五年改名《補天》，編入《故事新編》。

就同魯迅先生自己的想法完全相違。

“自己的對於古人，不及對於今人的誠敬”，兩句話很簡單，但抵得上一篇宣言。魯迅先生早就看出了那些提倡“復古”的人的存心，是爲了阻止中國人民的向前行進，因而予以猛烈的抨擊。在一九二五年寫的《忽然想到之六》說：

但是，無論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爲難的，而况保古。現狀就是鐵證，比保古家的萬言書有力得多。

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塗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祕製膏丹，全都踏倒他。（《華蓋集》）

魯迅先生是要向“保古家”們開火的，因爲所謂“保古”，其實不過是保護那種幾千年來“吃人”的制度，宣揚“吃人”是“仁義道德”的謬論。這一點，在《狂人日記》中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反對保古，自然要革新，那就需要有把一切妨礙進步的東西“全都踏倒他”的戰鬥精神。因此，他的選用歷史題材，決非“保古”，也不是孔丘所說的“好古”，而是爲了現實的需要。在《華蓋集》的一篇《雜感》中，他激動地說：

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罷！想出世的，快出世罷！想上天的，快上天罷！靈魂要離開肉體的，趕快離開罷！現在的地土上，應該是執着現在，執着地上的人們居住的。

這是“對古人不及對今人誠敬”的第一層意思。但是魯迅先生認為值得誠敬的“今人”，自然也不是指的隨便任何一個。兇惡的侵略者，渴血的殖民主義者，貪鄙的官僚，殘酷的地主惡霸，卑劣的幫閒幫兇，以及壓迫青年的“正人君子”，魯迅先生是加以口誅筆伐不遺餘力的。但對於反抗壓迫，敢於奮鬥，為大眾的利益而貢獻力量的人們，魯迅先生在他的筆下絲毫不掩飾內心誠敬的情緒，這因為他自己正是這樣的值得人們崇敬的人。一九三四年寫的《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裏面，便有這樣的意思：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爲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這一類的人們，就是現在也何嘗少呢？他們有確信，不自欺；他們在前仆後繼的戰鬥，不過一面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於黑暗中，不能為大家所知道罷了。（《且介亭雜文》）

一九三四年，中國的形勢還是處在從革命的低潮走向高潮的過程中，惡勢力在進行武力的“圍剿”和文化的“圍剿”，極力企圖用紙包住火，向廣大的民衆封鎖正義的聲音，因此有“不能為大家所知道”的說法。但從一九三四年十月，出現了二萬五千里長征這個偉大的創舉，而且在一九三五年十月，長征的隊伍勝利到達了陝北，這使魯迅先生看到了值得衷心崇敬的戰士的光輝榜樣。所以他在同年十二月所寫的這篇《序言》中認為要崇敬的今人，是很明確地有所指的。次年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說的話，便更加清楚了：

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着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且介亭雜文末編》）

這是“對古人不及對今人誠敬”的第二層意思。在同年十一月所作的《理水》，正表達了同樣的精神。

《理水》以夏禹治水的傳說為題材。有關的材料散見《尚書》、《禮記》等古籍，司馬遷摭拾起來，寫進《史記·夏本紀》裏。是否確實有夏禹其人，是否這樣地治水，由於今天還沒有發現直接可靠的材料，只能有待繼續研究。但是中國

古代有過嚴重的洪水為患，而名為“夏”的一個民族曾經為戰勝洪水而進行過艱苦的奮鬥，却是可以相信的。如同許多古代傳說一樣，往往把一個民族的重大事件附麗在某個傳說人物的身上，於是就有了禹治水的故事流傳下來。

《夏本紀》的有關記載是這樣的：

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於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濶。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檣，山行乘檻。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令益予衆庶稻，可種卑溼。命后稷予衆庶難得之食。……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於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

關於禹治水的神話和傳說，不在這裏作什麼考究了。但正如范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所說：“禹是古帝中最被崇拜的一人。許多古老民族都說遠古曾有一次洪水，是不可抵抗的大天災。獨在黃炎族神話裏說是洪水被禹治得‘地平天成’了。這種克服自然，人定勝天的偉大精神，是禹治洪水神話的真實意義。”（第一編・九四頁）相信這是《理水》故事受到魯迅先生注意的第一個原因。

治洪水也好，或者如有人所說，禹的功勞主要是進行了有利於農業生產的古代水利灌溉工程也好，首先這是為了大眾的，不是利己的，其次必須有艱苦奮鬥的精神。從歷史的觀點看，只有推動了社會前進的人們，才能有這種精神。過去的學者，如果是維護統治者利益的，決不會讚揚這種精神。儒家的孔丘，雖然不得不承認傳說中禹的功績，但他只是說：“禹，吾無間然矣。”（《論語·泰伯》）表示沒有什麼可以批評。這固然看到了孔丘的自大，同時也正說明了，代表在崩潰階段的奴隸主利益的儒家，並不願意正面肯定禹的艱苦奮鬥。反映奴隸利益的墨家便有截然不同的態度。《莊子·天下篇》就有這樣的記述：“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胫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蹠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這正是魯迅先生認為可以做“中國的脊梁”的“埋頭苦幹，拚命硬幹”的精神的具體表現。我以為這是《理水》故事受到魯迅先生注意的第二個原因。

所以，在《理水》中，我們看到作者着力刻劃

着禹和同他一起治水的戰友們的形象。

當洪水泛濫，使老百姓受到煎熬的時候，靠奇肱國飛車運糧食來接濟的“學者”們仍然可以在吃飽而午睡醒來之後，優哉游哉地“研究”禹是否一條蟲，鯀是否一條魚的“學問”；掛着“考察專員”名義的官僚們在吃够喝足之餘，對於水災的景象正大為欣賞。與此相對，禹出場了。

（水利）局外面也起了一陣喧囂。一羣乞丐似的大漢，面目黧黑，衣服破舊，竟衝破了斷絕交通的界線，闖到局裏來了。衛兵們大喝一聲，連忙左右交叉了明晃晃的戈，擋住他們的去路。

“什麼？——看明白！”當頭是一條瘦長的莽漢，粗手粗腳的，怔了一下，大聲說。

衛兵們在昏黃中定睛一看，就恭恭敬敬的立正，舉戈，放他們進去了。

這是作者介紹禹給讀者的第一個印象。雖然只是簡略的兩筆，但同前面用了大量文字描寫的學者、官僚們對比起來，便顯得非常突出。這一羣黧黑的、乞丐似的大漢，正是同洪水作過長時期艱苦搏鬥的人們。他們同那些只懂做官享福的“水利局大員”們，以至同那個警衛森嚴的衙門，是多麼不調和啊！作者繼續寫下去，便是禹進入局裏的大廳，那裏還擺設着“大員”們剛吃完的殘筵——

禹便一徑跨到席上，在上面坐下，大約是大模大樣，或者生了鶴膝風罷，並不屈膝而坐，却伸開了兩脚，把大脚底對着大員們，又不穿襪子，滿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繭。

古代人的規矩坐法是屈膝而坐，把屁股擋在脚跟上，就如現在日本人民間傳統坐法一樣（日本人的坐法本是從中國學過去的）。這裏所寫的禹的坐法，便名叫箕踞，被認為不大講禮貌。禹是大員們的上司，當然用不着特別講禮貌，而許多年都是在外邊奔跑，從事治水的勞動，也不大管那一套規矩了。但更重要的是，通過描述這個動作，把生滿了栗子一般的老繭的大脚底顯示在“大員”們的面前。而這些老繭，正是禹的奮鬥的忠實紀錄。

還有禹的“隨員”，也就是他所稱的“同事”（和“水利局大員”們完全不同的、真正的同事），也很重要。如果只有禹一個人，無論怎樣偉大，都是幹不出什麼事來的。他必須有一大批和他一樣，能够為共同目標而奮鬥到底的戰友。作者在介紹禹的這些“隨員”時，採用了有力而簡練的筆墨：

他舉手向兩旁一指。白鬚髮的、花鬚髮的、小白臉的、胖而流着油汗的、胖而不流油汗的官員們，跟着他的指頭看過去，只見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東西，不動，不言，不笑，像鐵鑄的一樣。